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28 冊

明末清初儒者經世致用之道（上）

簡 毅 銘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末清初儒者經世致用之道（上）／簡毅銘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4+216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編；第28冊）

ISBN：978-986-254-357-3（精裝）

1. 學術思想 2. 明清史

112.6

99016465

ISBN - 978-986-2543-57-3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 編 第二八冊

ISBN：978-986-254-357-3

明末清初儒者經世致用之道（上）

作 者 簡毅銘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年9月

定 價 十編40冊（精裝）新台幣62,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明末清初儒者經世致用之道（上）

簡毅銘 著

作者簡介

簡毅銘，民國六十年生於臺灣基隆。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八十九年度）、博士（九十七年度），專長領域為宋明理學及明末清初之儒學。碩士論文之題目為《何心隱思想之研究》，內容探討陽明後學之泰州學派，內容粗疏、論證薄弱，不值一看；博士論文則將觸角延伸至明末清初，題目為《明末清初儒者經世致用之道》，稍稍可看。曾發表學術論文兩篇，如今正著手第三篇之撰作，此時暫時任教於南澳高中。

提 要

明朝自神宗以後，國勢日趨衰微，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學者對陽明後學束書不觀、空談心性的虛浮風氣極度不滿，恰巧此時西學傳入，予知識分子一個新的刺激，於是呼籲重視「實學」的聲浪越來越高。這個呼聲反應在當時的學術研究上，就是由重視抽象「理」、「道」之研討，轉向重視形質之「氣」與「器」的講求。明清之際的這種「學術典範的轉移」，在當今學界已不知被多少學者所論述及探究過了。但是汗牛充棟的學術著作，卻罕有針對明清之際儒者的「經世致用」主張，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即便偶一涉及，又往往死守哲學觀點，令人一望便困倦欲眠。本論文以科際整合之法，融合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嘗試以新方法來理解東林黨及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及顏元的「經世致用之道」，並據之論斷是否可行，務使讀者不但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1
第二節 論文之章節安排及取材範圍	4
第二章 明末的社會文化與經濟情勢	7
第一節 明末之社會與文化	8
第二節 陽明後學之發展	14
一、陽明學派的建構	14
二、陽明學派的分化	17
三、陽明及後學對社會文化的因應	26
第三節 嘉靖至萬曆二十四年征礦稅前的經濟情勢	29
一、商 業	31
二、市鎮發展	35
三、風 俗	41
第四節 萬曆二十四年征礦稅後明朝的經濟概況	44
一、稅收弊端	44
二、戰爭、天災與脆弱的小農經濟	47
三、皇帝權要的掠奪	51

第三章 明末的黨爭	59
第一節 萬曆朝的黨爭	60
一、皇儲問題所引起的政爭 ——爭國本 妖書案 梃擊案	62
二、萬曆中期以後之京察、外察	65
第二節 天啓朝的黨爭	75
一、天啓初期	76
二、天啓後期	79
第三節 崇禎朝的黨爭	83
一、周延儒、溫體仁合作時期	85
二、溫體仁專政時期	88
三、薛國觀當政時期	92
四、周延儒再相時期	94
第四章 西學的傳入與學術思想	99
第一節 明末清初傳教士來華及傳教策略	99
一、傳教士來華的歷史背景	99
二、傳教士在華傳教的「調適策略」	101
第二節 傳教士所傳入的西方科學	109
一、地理學	110
二、數學	112
三、天文學	114
第三節 中西文化的交融及衝突	121
一、中西關係融洽期	122
二、中西關係衝突期	127
第五章 東林黨的經世致用之道 ——以顧憲成、高攀龍、李三才為主	141
第一節 政治領域	145
一、論君主	145
二、論官僚	149
三、公民意識與輿論	153
四、變通行政救民生	157
第二節 經濟領域	159
一、逋賦與改折	159

二、商人與救災	163
三、商稅與民生	164
第三節 軍事制度與社會控制	166
一、軍事制度	166
二、社會控制	169
第六章 黃宗羲的經世致用之道	179
第一節 政治領域	180
一、論君臣	180
二、論制度	186
第二節 經濟領域	198
一、稅率與田制	198
二、以銅幣及紙鈔代替白銀	200
三、以差役士人代胥吏	205
第三節 軍事領域	208
一、明朝兵制之缺失及替代方案	208
二、士人應曉軍事	212
三、方鎮自治	215

下 冊

第七章 顧炎武的經世致用之道	217
第一節 政治領域	217
一、論君主	218
二、論制度	219
第二節 經濟領域	237
一、公平的稅賦	238
二、靈活的稅收及尊重市場機制	239
三、貨 幣	242
第三節 軍事與社會控制	250
一、軍事領域	250
二、社會控制	258
第八章 王夫之的經世致用之道	273
第一節 政治領域	273
一、論君主	273

二、論臣道	280
三、政治制度	285
第二節 經濟領域	295
一、天子大臣應知財政	295
二、人民擁有土地私有權	297
三、稅 法	299
四、土地兼併與自耕	304
五、貨 幣	308
六、行 鹽	315
七、尊重市場機制	317
八、國際貿易	320
第三節 軍事與社會控制	321
一、軍事領域	321
二、社會控制	330
第九章 顏元的經世致用之道	345
第一節 斥程朱理學及佛道	345
一、破一分程朱，入一分孔孟	347
二、排佛道，崇儒學	352
第二節 政治領域	356
一、井田制度	358
二、封建制度	360
三、教育與詮選	365
第三節 軍事及社會控制	370
一、軍事領域	370
二、社會控制	374
第十章 結 論	381
參考書目	38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一、研究動機

筆者的碩士論文以泰州學派為研究範圍，論文題目是《何心隱思想之研究》。當時撰作碩士論文時，就有一個疑問不斷地困惑著筆者。那就是，「泰州學派」普遍受到極其嚴苛的訾議，但是弔詭的是：泰州學派重視個人情欲及生活需求的滿足，以及認為天理與人欲並不對立等觀念，卻能在批評泰州學派之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類似的言論。這代表什麼意義呢？會不會是有更強大的因素決定了這個時代的思潮，所以不論是贊成或反對泰州學派，卻都不期然而然地展現了某些極其相近的思想特質。於是筆者決定追索泰州學派興盛之後，思潮起了怎樣的變化，這是筆者將研究觸角伸向明末清初最主要的原因。起初，筆者頗擔心明末清初的大儒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早已是研究的重心人物，是否仍有研究的必要，會不會讓研究變成 research。為了消除這番顧慮，筆者將電腦連上國家圖書館網站，搜尋研究論題與明末清初思想相關之博碩士論文。先就各作者所自撰的論文摘要以窺其研究方法及關注焦點。結果發現大多數的人雖注意到了明末清初是學術典範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提出這一時期是重視「經世致用」、「集私為公」、「天理在人欲之中」等概念。但是卻沒有以「科際整合」做為研究方法，並試圖分析這一時期思想家所提出之「經世」主張是否可行的著作。當然，經過這些年的學術訓練，筆者也不是毫無警覺。什麼警覺呢？確實分析明清之際儒者經

世之道將耗費大量時間精力以及科際整合難度頗高的警覺。但是生性就是「打破砂鍋鑿到底」，這些論文所提供的答案無法滿足筆者，再加上個人也深以只泛讀過幾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的經典著作爲恥，於是決定親自探究，自尋答案。爲了讓研究更加紮實，筆者圈點古籍的部分選擇的是篇幅巨大的《清儒學案》，雖然不得不承認常有點了後面忘了前面的情形，但是卻發現同一時期儒者的關注焦點，常常是近似的，學者間的往來是密切的。這也使筆者更加深信透過研究明末清初儒者經世之道，應可以發掘、了解他們面臨了什麼樣的共同困境，及他們的共同關懷又是什麼？

二、研究目的與方法

就此論文的撰作而言，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幾乎是無法分割的。那就是——以科際整合的方法，老老實實地探究明末清初儒者經世之道。本論文不再講虛無飄渺的「氣本論」、「集私爲公」、「天理寓於人欲之中」等概念，因爲明末清初這一類的典型轉變，早已是人人皆知的常識了。換言之，明末清初這一時期，並不缺乏闡明思想典範轉移的學術著作，缺乏的是鑽研這一時期思想家所提出的各種主張是否可行的著作。當然也有討論個別思想家理論的學術著作，但是卻又死守哲學觀點，不能打破學術成見，論點千篇一律令人生厭。於是筆者鼓起愚勇，紮紮實實地將注意力放在各思想家所提出的經世主張，並力求以今日各學科（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的知識來解釋他們所提出的理論，使人理解各思想家理論的優劣及可行性。

（銘按：分析雖不一定正確。但是筆者已盡可能地融入各思想家所面臨的環境及設想各種條件的限制了）

「科際整合」是近幾年來常常聽到的一個名詞。對筆者而言，「科際整合」首先代表的是「問題意識」，在閱讀各思想家的著作時，筆者不斷地自問：他們提出了這樣的主張，是基於什麼樣的背景？目的是什麼？可否有效施行？可用現今的何種學科理論來闡釋？其次，「科際整合」對筆者而言代表著——「難」。數年前在網路上看到王汎森在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的講稿〈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其中有一段談到「突破學科間的界限」。他說：

應該要把跨學科的學習當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跨學科涉及到的東西必須要對你這棵知識樹有助益，要學會到別的領域稍微偷打

幾槍，到別的領域去攝取一些概念，對於本身關心的問題產生另一種不同的啓發，可是不要氾濫無所歸。爲什麼要去偷打幾槍？近幾十年來，人們發現不管是科學或人文，最有創新的部分是發生在學科交會的地方。爲什麼會如此？……在平台本身、在學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經 search 太多次了，因此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創新，所以爲什麼跨領域學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註1〕

在筆者看完了王汎森的這一篇講稿後，心有戚戚焉。興起了有爲者亦若是的壯志豪情。但是今日卻不能不有小小的哀怨，王汎森忘了告訴筆者這個工程是何等的浩大。筆者如何涉獵各學科？又是如何起步？首先，筆者先上各大學政治系、社會系、經濟系等科系，看各大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大一基礎課程採用何書，不斷重覆者即可斷定必爲重要之書。接下來，購置、研讀「重要之書」，若讀不懂再退而求其次——先讀入門書。以社會學爲例，筆者先讀的入門書是《見樹又見林》、《社會學動動腦》，等到稍有概念以後才回過頭來讀安東尼·吉登斯的《社會學（第四版）》及王思斌的《社會學教程（第二版）》，其他各學科大抵都經歷了同樣的過程。接下來再談談筆者到別的領域偷打了那幾槍。在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中，筆者投入最多時間的是社會學。首先，筆者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第四版）》中，注意到「文化衝擊」的現象。於是筆者想，明末以利瑪竇爲代表的耶穌會會士，他們在傳教的過程當中，必然歷經過「文化衝擊」，他們的著作也必然保存了一些當時國人習以爲常，但他們卻以爲奇異現象的記載。果不其然，《利瑪竇中國札記》，就記載當時（明末）儒者對最新西方數學、天文及地理知識幾近無知的狀況。同時此書也詳細記錄了萬曆皇帝徵礦稅及查妖書時北京詭異的氣氛。甚至馬堂搜括教堂的惡形惡狀，也鉅細靡遺地被記載下來，這些記載都是頗有價值的史料。除了《利瑪竇中國札記》之外，利瑪竇另一著作《天主實義》亦頗爲重要。這本書在明末流傳極廣，書中倡言：依自立、依賴之說，朱熹的理先於器的理論是錯誤的，主張先有物而後有物之理；在天主之前，國君、父親都失去其尊貴，人人的行爲都應以教義爲依歸；利無傷於德，利義可並存。《天主實義》的這些說法，恰好與明清之際倡言的「理在氣中」、「天理寓於人欲之中」等主張相近。就此而言，明末耶穌會會士與儒

〔註1〕此文爲王汎森於2005年10月29日在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之演講。本文乃取自網路上之講稿全文。

者之交往及對這一時期思潮所起的影響，實有重新衡量的必要。但是這一種衡定的工作，需要爬梳大量的文獻並從中找出確切的關聯，實非小小博士生所能勝任。再者，這一時期的思想家幾乎不承認某個思想是受到傳教士或西方所傳入的書籍所啓發，所以也只能將耶穌會會士所傳入的觀念及書籍置於時代背景來討論了。筆者從社會學中得到的第二個啓發是由《社會資本》一書來的。這本書不斷的強調，在人類社會中，財富、權力、聲望三者是最被看重的社會資本，而這三者的互相轉換，在任何社會都被視為是極其自然且合理的。筆者曾以這個理論來說明明朝中葉以後商人地位提高的原因，也曾據此說明官俸與貪污之間的關聯。在政治學方面，《政治學十五講》講到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則，即任何掌權者都會盡其所能地擴張自己的權力，直到受到限制為止。筆者以這個理論來說明以道德來規範要求君王是不切實際的。當然在政治學這個領域上，筆者做得更多的是將西方約略同時期的經典著作如：《政府論》、《利維坦》，與這一時期思想家們所提出的類似主張，互相證明、補充。

在經濟學方面，給筆者較多啓發的是高希均、林祖嘉合著的《經濟學的世界》，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洛克的《政府論》（按：《政府論》雖屬政治學領域，但全書亦有不少關於經濟學領域的理論）。筆者由《經濟學的世界》一書，了解到貨幣出現的原因及被當成貨幣所需要的條件、課稅的原則、供給需求原則，這個可以用來說明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主張用銅幣、紙幣的可行性；稅賦制度以及糶米與糴米。筆者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印證了兵制的優缺點及國際貿易及分工的必要性。筆者也由《政府論》中汲取「土地私有」的理論，印證王夫之的主張。以上僅就記憶所及，略述一二。通覽全書後，自可知筆者用心所在。

第二節 論文之章節安排及取材範圍

本論文共計十章。首章為緒論，分成二節。首節說明：作者的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研究目的。次節說明：本論文之章節安排及取材範圍。第三節則論述相關之文獻。第二、三章說明明末的時代背景（按：因為東林黨及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所提出的各種經世之道都是以明朝之弊端為假想對象。

顏元《四存編》則看不出時代烙印，所以說明明末之時代背景已經足夠了)。第四章則將眼光放在明末耶穌會士進入中國所傳入的科學人文領域的觀念，筆者認為異質文化的刺激，極可能助成了明末清初思想之轉變。第五章至第九章則分別探討各思想家之經世主張，每章的又大抵依政治領域、經濟領域、軍事領域及社會控制來分節。筆者之所以這樣分節是發現這種分類方式可以將各思想家經世理論包羅在內，又可適當歸類。接下來再說明何謂「經世」及本論文在時間上的上下限。「經」有治理義，所以「經世」純就表面的字義可以解釋成：治理社會。陳祖武也說：「晚明的經世思潮，是一個旨在挽救社會危機的學術潮流，它具有益趨鮮明的救世色彩。因而一時學術界中人，無論所治為何種學問，救世都成了一個共同論題。」〔註2〕小野和子詮釋張溥《經世文編序》「余間語同志，讀書大事，當分經、史、古、今為四部。讀經者輯儒家，讀史者辨世代。讀古者通典實，讀今者專本朝。」之語時也說：張溥把學問體系分成經、史、古、今四個部分，「經」是探求政治原理，「古」是追究基于此而實行的制度，「史」是探求歷史變遷之迹，「今」是議論現代的政治制度。就他來說，「古」不是作為「今」隔絕無關的過去的世界，而有著作為探討現代政治制度應有樣式原點的意思〔註3〕。換句話說，張溥眼中「經世」，實際上就相當於是政治原理、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原理、制度施用於古今的效用。梁啟超也指出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代表的明遺民「他們對於明朝之亡，認為是學者社會的大恥辱、大罪責，於是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專談經世致用的實務。他們不是為學問而做學問，是為政治而做學問。他們許多人都是把半生生涯送在悲慘困苦的政治活動中，所做學問，原想用來做新政治建設的準備。」〔註4〕結合陳祖武、小野和子、梁啟超三人的說法，筆者們似乎可以這麼說：明末清初儒者所提出的各種經世主張，首先是為了挽救明末社會層出不窮的各種危機。等到明亡了，又是為了反清復明所需的政治建設做準備。由於經世目的有這樣強的針對性，所以為何這些思想家的經世主張常常可以看到明末的政治、經濟、軍事及社會弊端的影子，也就絲毫不令人意外了。再談談本論文的時間斷限：上起明萬曆下迄清康熙的原因。

〔註2〕陳祖武、朱彤窗：《曠世大儒——顧炎武》（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頁33。

〔註3〕〔日〕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頁268。

〔註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里仁書局，1995年2月），頁19。

陳祖武曾說：

清初的學術是明清更迭的歷史產物。〔註5〕

又說：

什麼是明清更迭？它實際是一個歷史過程，這一過程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其上限可一直追溯到明萬曆十一年（1583），清太祖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興兵；其下限則迄於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最終清除亡明殘餘，統一台灣。〔註6〕

陳祖武「清初的學術是明清更迭的歷史產物」的說法，不能說「錯」，但是考量訓詁、聲韻等小學興起於明末的情況，若言「清初的學術是明清更迭以及學術內在轉化的共同產物」可能更為完備些。此外，「明清更迭」也可以再稍加補充。若將「明清更迭」界定為兩個朝代的一興一衰的一段歷程，這當然沒有問題。但是若「更迭」指的是新朝代取代舊朝代的統治地位，則這個定義恐怕就有點爭議了。雖然如此，陳祖武所定義的「明清更迭」仍有極大的意義。因為這一段時間從明朝的角度看：正好是明朝由衰微至徹底滅亡的過程；從清朝的角度看：則是由初興到徹底控制整個社會的過程。康熙二十二年之後，整個中國又進入了大一統及嚴格社會控制的時期，學術及社會的氛圍再也不一樣了。所以自明朝萬曆以迄清朝康熙二十二年這一段時期，對於認同明朝的儒者而言，實無啻為「一個帝國與文化崩解的歷程」，所以黃宗羲曾以「天崩地坼」形容這一段時期。前乎此，是王學盛行的時代，後乎此是朱學復盛的時代，明萬曆至清康熙的思潮自成一格，即所謂的「實學」或「經世致用」之學。基於上述的認知，本論文所錄之思想家上起萬曆時期的東林黨顧憲成、高攀龍、李三才，下迄康熙時期的顏元。顏元之卒年已進入十八世紀初（1704），這時清朝的統治地位已經穩固，所以社會要求大一統（政治上強調一元價值），所以思潮也開始轉變了。但是由於顏元對清末的實學思想有一定的影響力，所以本論文仍將其納入討論之列。

〔註5〕 陳祖武：〈論清初學術〉，《清代學術論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11月），頁133。

〔註6〕 陳祖武：〈論清初學術〉，《清代學術論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11月），頁133～134。

第二章 明末的社會文化與經濟情勢

人類的文化總是與當時的生活環境相繫聯。例如古希臘地瘠人多，爲了生存不得不向外發展，便形成一種不畏挑戰、變化的文化特質；中國則地大物博，在隋唐以前，並不缺乏可耕種的土地，加上中國各省之物產不盡相同，省際貿易即相當於國際貿易，中國不需要與國外有貿易之往來，在與外國貿易往來時都以天朝自居，將外國視爲化外之地。這種將國際貿易視爲施恩，不主動開擴國際貿易，其實是一種自閉、保守的心態。但是這種心態，又與重安定、規律、秩序的農業文化脫不了干係。

宋朝以後，人地比急遽惡化，人口已逐漸超過了土地所能供養的數量。於是輸入占城的早熟稻，初步解決了人口過多的問題。宋代的人口約莫四千萬，但是到了明末人口卻有一億五千萬左右，不論再如何精耕細作也無法消化所增加的人口。換言之，農業耕作所需之人口已趨於飽和，非得有人自農業中游離出來不可。明代自正、嘉以後，中國被捲入世界貿易的一環，西、葡二國自東南亞輸入了香料、自美洲輸入了白銀，以換取中國的絲、瓷、棉布等商品。由於明朝與西、葡二國之間的貿易，使得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江南迅速積累財富，江南更成爲富人集中的地區。對外貿易的利潤極爲可觀，商人急於誇示自己的財富，亭園華屋、錦衣玉食已成爲稀鬆平常的事。復以此時政治力薄弱，使得商人得以毫無忌憚的展現其財富。貴賤等級的法律規定，至此成爲一紙空文。商人的地位改變了，由四民之末轉變成與士人平起平坐的領導階層。

商人變成社會上的領導階層之後，也帶來社會風尚的轉變，財富與能力漸漸被劃上等號，於是有權但無錢的官員就以「權」換「錢」，官箴自此沉

論。小民也追隨商人所引領的時尚以彰顯自己的品味與能力。有許多成功的商人，從商並非他們職場生涯的最優先選擇。他們從商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家庭因素，也可能是因為業儒不成才轉而從商。所以當他們經商有成，累貲鉅萬之後。他們往往會追求心靈上的滿足，戲曲、小說等當然可以滿足他們，但是有些商人追求的是哲理的滿足。於是哲學理論必然要更簡易直捷，雅俗共賞，才能適應新的對象。王陽明「致良知」等良知教及王門後學泰州學派等，在成德的方法力求簡易明白，顯然是為了日益擴大的受教群眾。

第一節 明末之社會與文化

林南《社會資本——關於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指出：在人類社會中常將權力、財富、聲望三者間的彼此交換視為理所當然之事。但是據《明史·輿服三·庶人冠服》之規定，商人止能衣絹、布，農人則除了絹、布之外，還可以衣紬、紗等質料更好的衣服〔註1〕。換言之，一個人所能享受的物質生活，並不取決於經濟條件，而是決定於社會階層：士、農、工、商。這與民間以為貨幣可購買財貨、勞務的普遍認知顯然不同。於是當政府的政治力減弱之後，財富的影響力才得以如實顯現。財富可以使後代子孫享有更好的教育資源，從而有更多的機會獲取官職。這造就了一個現象，士人出身於商人之家的比率越來越高，士商之界線日益泯除。

士商界線泯除，文人更加認同商人，願意為商人的利益發聲。當然，商人也透過賑濟、造橋、鋪路等社會救濟及公共工程來提升自己的聲望，以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商人」的社會地位改變了，他們的需求受到重視，他們的習尚引領社會，並形成一種時尚。他們的地位更得到哲學家由哲理的探討「義利」來給予重新界定。本節主要探討的就是明中葉後商業發達後，所呈現出的種種文化樣貌。

戴維·米勒提出一種正義多元論〔註2〕。他從人類關係模式出發，分析出三種基本的關係模式。分別是：

〔註1〕「〔洪武〕十四年令農衣紬、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得衣紬、紗。」〔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二十四史縮印本），卷六十七，頁1649。

〔註2〕〔英〕戴維·米勒著、應奇譯：《社會正義原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頁34～40。